■新作聚焦

孔见的《海南岛传》：人文历史写作的佳构

□马 良

目前为止所有写海南岛人文历史单本著作中，孔见的《海南岛传》无疑是一部出色的佳构。这部书的意义不仅限于海南一隅，对于如何书写一个地区的人文历史，作者提供了一种有借鉴意义的实践方法。

《海南岛传》的写作，由于历史的加入，使得作者比较突出的文学、哲学长处，又有了厚重历史的依托。文中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得益于作者写小说时塑造人物的技巧，也得益于他写散文时犀利俊逸的文笔，更得益于儒释道方面沉潜的功力，第一次完成了文、史、哲的“三位一体”。孔见一直不满意当代文学受“翻译体”影响下的“纯感觉描写”，他以为缺少思想的观照，较少回味。这本书的写作更像是回溯中国传统文化人的写作路径，并在新时代下与时俱进，有所发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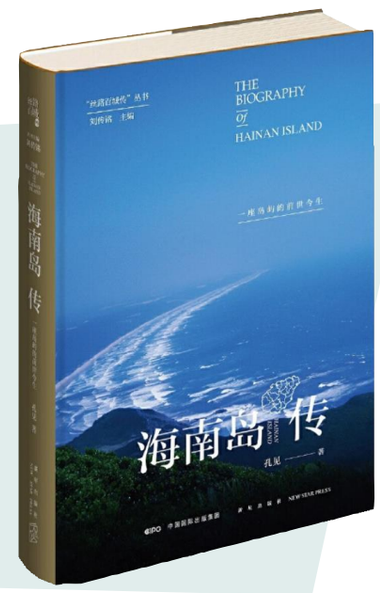
一个地区到了特定的时间，一定会寻找“身份认同”。对海南岛的书写，古往今来，也费尽学士才人们的心血，就是海南建省30多年来，这样的写作也屡见不鲜。但是客观而言，不少历史研究学者、写作者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还沉浸在对一草一木不放过的“田野考古”式的描述之中，缺乏精辟的思想升华；另有一些著作则多少有些玩弄概念游戏，缺少生动的历史细节，也缺少独到的发现。尽管孔见此前的写作关涉历史之处并不太多，但这部《海南岛传》说明了他其实是一个极具水准的历史领域的开拓者。这当然与《海南岛传》是其立志、发愿之作有关，他不愿将此书写成可有可无的应酬、应景、应制之作，因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古人对话，在广泛占有历史材料并细心甄别的基础上，做出了大胆的取舍。总体而言，作者做到了详略得当，论述精赅，具备了一部“良史”的诸多优点。他不像有些历史写手盲目采信民间历史传说，而对地方志、家谱族谱等第一手资料下了大工夫；也不像有些学者呆板地无视传说，他从不放过民间传说的生龙活虎，但也不陷入“怪力乱神”的虚妄，而是有判断更有操守，在历史本质的把握上堪称精准。

海南岛的历史从来不仅仅限于海南的范畴，无论是与中原文化的几千年的融汇、互动，还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支点与外界的联通，对海南历史的书写，显然要有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通识。在这方面，孔见的《海南岛传》做得颇为到家。对于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挖掘，时时处处体现出文化史、思想史的高度，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此前所见各地人文历史写作中所不太具备的。尤为可喜的是，孔见在对与海南有关的历史文化人物的描述、评论，主要写其海南经历，但也以相当多的篇幅兼及其“全人”，这样一部海南岛史，实在是分量十足的。例如孔见对苏轼的书写、对海南文化传承宋文化的论述，都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当然，关键还在于孔见这样的人文素质包括其丰富经历，并不是很多人文历史写作者所能具备。但是，既然孔见创造了这样的标高，则我们不妨也张扬一下海南人文历史写作者的自信，就像当年的白玉蟾、丘濬、海瑞等琼岛先贤一样，在他们坐享海南的地利、又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之后，开始了海南文化向外输出的过程。今天，曾经领改革开放之先、又拥有世界最大自贸港的海南，回首历史，比如黄道婆、下南洋、“十万人才下海南”等等，也曾经走在时代的前列，为何不能于当代人文历史写作方面，也于全国同行中领先一步呢？

从《海南岛传》结构而言，孔见对宋以前海南人文历史的叙述是比较简要的，但简要不是简单，而是精练。在篇幅不长的起始篇章里，由地理而人文，写下了对海南岛原始居民黎族的印象，写了台风、洪水等海南岛上难以抗拒的灾难，并感慨“在这座风雨飘摇的孤岛上扎根，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而正是这种艰难险阻，造就了黎族人坚韧、彪悍的性格。后来的人与他们交朋友，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从“伏波将军的白马”到“母仪天下”，写了海南岛进入中国版图到真正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时间跨度从秦汉到隋，主要人物是路博德、马援两大伏波将军和巾帼英雄冼太夫人。

在“千年流放史”中，作者不限于写海南的流放史，还回溯了中国从尧舜禹时代开始的流放史，通过整体历史的观照，极大地加强了一地历史文化书写的厚度。从宏观视野为主的“千年流放史”，到“生度鬼门关”着重写杨炎，再到“渡琼先祖”“命运的抛物线”写王义方、韦执谊、李德裕等，以及“苏东坡：死透了的大活人”“从五公祠到盛德堂”写李纲、李光、赵鼎、胡铨等，都在书写对海南文化影响甚大的贬官。东坡居琼仅仅三年，孔见却为他写下三万六千字，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一。这是出于苏东坡之于海南的重要性和这个人物的丰富复杂性的考虑，苏轼给海南历史文化树立起一个标高，孔见通过对他的解析向中华文化致敬。

> 孔见的《海南岛传》对于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挖掘，时时处处体现出文化史、思想史的高度，为人文历史书写提供了方法，是一部常读常新、愈品愈醇的佳作。



在苏东坡创造了中国文化高峰的宋代，海南同样迎来了最重要的一次移民潮，并从根本上塑造了自身的文化根性，这就是本书第13章“衣冠南渡：从闽南到海南”的内容。孔见不仅拉开历史的广角镜，将五胡乱华的“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后的“衣冠南渡”与靖康之变后的南渡逐一呈现，并且揭示出这第三次南渡，也是与海南关系最密切的一次南渡的文化史上的意义。“此次衣冠南渡，一直持续到蒙元占领中原、南宋灭亡为止，时间之久，规模之大，超过以往的两次。南方的人口从此超过北方，南方的经济文化因而变得郁郁葱葱。自此，中国形成了政治中心在北、经济文化中心在南的格局，并且延续至今……倒是南方以及南方之南，保持着汉文化的某些遗韵。”“尽管自然地理上，海南与广西广东临近，历史上也先后归属于两广，但在人文地理上，海南是闽南文化的一个单元。更准确地说，海南文化是宋朝文化的余脉，属于汉文化较为纯粹的一条支流。”这是否为孔见的独见不好说，但肯定是本书最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之一。此后，在“儒学的补阙与践行”“利玛窦的中国朋友”“憨山大师与琼州大地震”这几章里，孔见写了丘濬、海瑞、王弘诲、许子伟等明代海南士人的形象。

进入清代，海南社会经济文化总体不比从前，尤其历史文化名人的质量大大降低，因此孔见也很少再用个体肖像的描绘，而是更多群像的勾勒，像“清代诗人的生活”一章，角度颇为新颖别致。“海盗与烈女”一章内容此前较少有人关注，从中也可见出杀伐动乱之气渐重。孔见以岛人的身份现身说法，其实也是吁请人们对岛民心理和性格予以更大程度的理解。

这风云激荡之势，在本书的最后几章里，体现得十分充分。“一个显赫家族的发祥”写的是某种程度上主宰了现代中国史的宋氏家族，“革命的行者”主要写张云逸大将兼及周士第将军，“冯白驹与娘子军传奇”写了琼崖纵队“23年红旗不倒”，“小镇上走出的将军”写了文昌的近200位将军中的几个典型，“洗不清的罪恶”一章是对侵略海南的日寇暴行的血泪控诉。面对这几十年历史沉重和激越交响的基调，作者的笔法是冷静客观的，也是富于人性的。

正如作者自述，“本书首先是一部史传，然后才是文学作品。”总体来说，《海南岛传》史识高明、脉络清晰，详略得当、意蕴丰厚，笔法犀利、文辞隽永，是一部常读常新、愈品愈醇的佳作。

■创作谈

时光里的石头

□孔 见

时间是一条遗忘的河流，随着年事的增升，它的江面似乎越来越波澜壮阔。《海南岛传》的写作，于我而言是一次逆流而上的摆渡。许许多多沉入水底的事物，如同河床里的石头，逐个露出了水面，显现出峥嵘的样子。

这本书的写作，仿佛就是我个人身世的自述，打通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紧闭的大门，让我得以和他们共同经历进退沉浮与生老病死。自这座小岛从大陆裂开的刹那，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感同身受地发生在我的心口，石头纷纷地向我砸来，并掀起了难以平复的浪涌。从很早的时候起，我就意识到自己降生在一座岛上，它已经被腥咸的海水重重包围，都承受着波浪永无休止的冲击，所有坚固的事物都已遁离，朝任何一个方向走去，最终遭遇的都是深渊与迷津。一种被遗弃的凄怆，一种远离依靠的孤独，渗透了我经验的全部，使之浸润着海水的苦涩，我的行为总是不能够理直气壮。这座岛屿似乎只是一片眺望世界的舢板，而我不过是剧场外找不到座位的观众。在记忆的影像里，从童年开始，我就常常站在野菠萝的海岸上，久久眺望水天苍茫的远方，所有美好的事物，都隐藏在海平线的背后，与我横隔着无数愤怒的波涛。我并不清楚这些事物真实的模样，但它们已经令我心神不宁。我夜里的睡床如同一叶扁舟，颠簸在惊涛骇浪的洋面，直到若干年前，我才渐渐有了靠岸的感觉。而所谓靠岸，并不是我抵达了大陆的某一处高地，我仍然置身于海里，居留在这座岛上。

海南的一些港湾，至今生活着蜑民的部落。他们完全可以到陆地上来安家，构筑石块或砖瓦的房屋，躲避暴风与激浪的冲击。这不过是举手之劳，但他们仍然选择留在水上，不接受任何上岸的动员与劝请。岛屿给予人的感觉，就像是一条漂泊的舟船。岛民的身份，就是在波峰浪谷间安家，让一切该发生的都发生在你身上；而不在你身上发生的，就意味着不应该发生。你必须为发生的欢呼鼓舞，即便它剥夺了你所有的衣裳，包括衣裳里包裹的身体；你不必为不发生的追悔懊恼，因为那一切都与你无关，尽管它们想象起来是多么璀璨。

对于生活在上面的人，海南岛曾经是逃亡之地、躲避之地、流放之地、眺望之地。作为住民，我也曾经狼狈地生活在这片浮土之上，仓皇地寻找安身之所。现在，这里已经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一个坚实的原点，既是出发之地，也是抵达之地，一个可以顶天立地地站立的地方。世界虽然浩瀚，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得去走遍，传说中的九坛金、九坛银，早已埋藏在这岛上，地里、水里、风里，几乎无所不在。此时此刻，这座岛屿显得那么完整，具足生命存在的全部要素。

岛屿是极具概括性的象征之物，有着清晰的边缘和无涯无际的空落与虚玄，空虚之中似乎回荡着一种亘古的钟声。我是岛上一个古老家族的子孙，在我的身后，已经有26代祖宗的尸骨埋入了黄沙。我曾经说过，我不明白900年前光荣的祖先，为什么把子孙抛到这座荒岛上，让他们成为孤独的守望者。现在，我终于领会了埋得太深的善意，不再左顾右盼和四处投奔。折断了多余的翅膀之后，我彻头彻尾地成为一个土著，一棵长不大的花梨木。很多的场合，我都以一个土人自诩，声称是那个最热爱海南的人。许多年前，我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把自由退还给与我相关的事物，不再要求它们迎合或屈服于自己的意志。

时间是那样的湍急，浮在水面的事物，还来不及弄清楚河流的方向，就已经沉入水底，变成坚硬的石块。《海南岛传》的写作，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起意，搬弄石块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只是没有付诸文字罢了。如今，无形的写作变成有笔画的文字，算是对我生身的海岛有了一个回响与交代。

也许有必要向读者说明，本书首先是一部史传，然后才是文学作品，其中的文字不仅是想象力的产物。在尊重基本史料的前提下，笔者力图再现历史的现场，复活人物的原形，并试图与他们说上话，在细节上做出必要的展开。众说纷纭的地方，也尽量在占有资料的条件下，做出采信的选择。无法确凿又不能证伪的史实，则作为一种可能性加以演义。至于文体的运用，我愿意保持切换的自由度，将所叙述的事物置于开阔的视野，加以观照与处理，以获得充分阐释的回旋余地，而不止步于客观的罗列。当然，我无意要写一本通史或全史，只是通过一些有意思的人物活动和事件的演变，寻找走进历史深处的入口。完整的画卷仍然有待于读者的推演与想象，至于不足与错漏的地方，更期待有识之士的指谬。

（上接第2版）

二是注重打牢基础，大力加强党的建设。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抓住关键环节，突出政治功能，切实提升组织力。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认真落实“三会一课”、谈心谈话等制度，切实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下大气力锻造政治强、懂文学、敢担当、有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三是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着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定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上来。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抓住“关键少数”，健全责任体系，压实责任链条，一以贯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把坚持与深化、补短板与防反弹结合起来，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持续深化纠治，始终保持“紧盯严防、持续发力、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坚决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

四是深化巩固巡视整改成果，推动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坚持把巡视整改与作协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与抓好主责主业结合起来，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文学事业、作协工作繁荣发展的突出问题。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群团工作重要论述，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深入查找差距和不足，既要做好“当下改”的工作，更要按照“谋长远”的要求，进一步创新思路举措，持之以恒抓好落实。认真查找在联系、服务、管理、引导作家尤其是团结引导网络作家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加大工作力度，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认真梳理上次巡视和本次巡视发现的共性问题，从源头上堵塞漏洞，扎牢制度笼子，深化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视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电话：010-64489700；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电子邮箱：zxmishuchu@163.com。

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
2020年11月6日

（上接第1版）

11月3日，福建作协组织召开福建作协主席团线上学习会，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会议传达学习了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和中宣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关于福建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意见，福建宣传文化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福建作协系统要深刻认识全会的全局性、历史性重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大家一致认为，全会审议通过的规划建议，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五年和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对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之后备受鼓舞、催人奋进。福建作协将在近期的培训和活动中进一步组织大家深入学习，并通过“福建作家”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加强宣传，引导广大会员、文学爱好者认真学习。今后，福建作协将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作协工作中，努力推动福建文学事业繁荣发展。（欣 闻）

■新作快评 海勒根那短篇小说《请你喝一碗哈吐布其的酒》，《民族文学》2020年第11期

游走于现实与超现实的交叉点上

□兴 安

海勒根那是个被忽略的作家，他的《寻找巴根那》《父亲鱼游而起》等几篇代表作品，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完成，却没有被重视和认识。这与21世纪初“80后”被过度地追捧和关注有关，由此遮蔽了“70后”的真正实力与潜力。海勒根那与此整体的怪象有关，但他被忽略的同时也与当时内蒙古的文学氛围有关。在上世纪80年代“50后”作家们的辉煌之后，内蒙古的小说创作从“60后”开始便进入低潮，乃至有人说是断档，一直波及到“70后”。说是断档，其实也是表面现象，无论怎样，无论何时，总有一些作家在默默地耕耘，以其独特的写作方式，坚持着小说的创作和理想。海勒根那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位执著者，但是，执著并不等于不失落、不沮丧、不怀疑。记得就在去年，我与他在呼伦贝尔的新巴尔虎右旗草原旅行，他就曾表露过对小说现状的失望，对自己的创作也产生了怀疑，甚至考虑到转行恢复诗歌写作。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共同计划编辑出版一本他的短篇小说集，以整体的面貌展示海勒根那的创作，这便是后来出版的《骑马周游世界》。

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反响。评论家崔荣认为：“海勒根那所追寻召唤的蒙古马精神、骑手精神和黄金世界般美好的往昔世界，都从坚实的大地升华而来，来自于他对现实锋利深入的省思。”评论家姚广认为：“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写作着眼于人之生存的心灵困境，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仅仅局限于自我拯救，相反，他不回避社会矛盾且专注于需要精神援助的人事和大地，并在困境与荒原中突围，体现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担当与勇气。”6月，内蒙古作家协会在呼和浩特专门为这本书举行了新书发布和读者分享会。9月26日，经过20多年寂寞写作的海勒根那终于获得了国家级的奖励——“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后的海勒根那，竟然收到众多的约稿邀请，他自己也感到意外，自嘲说：我仿佛一夜之间成了我们家乡的名人。这句话很像是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感慨。看来一个作家或许真的需要一个重要的奖项来昭告天下，以获得认证。法国文学评论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曾经谈到一个观点，即“文学祝圣”。他引用了西方宗教的一种“祝圣”仪式，即给人或物做上上帝的标志。他认为文学和作家也是如此，在以西方，比如巴黎或者伦敦为文学中心的世界文学观念中，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最可信最权威的文学裁判机构，全球性的作家必须以它们的承认才能获得一张全球性的证书，以取得文学的祝圣。我想，在中国也大抵如此，获得全国性的文学奖项的承认，或许才会让一个作家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这种现象卡萨诺瓦称之为“文学通关”，即“对于那些来自文学贫瘠地区的文本来说，重要的祝圣所带来的神奇蜕变是一种质的飞跃，是由不存在走向文学存在，从不可见走向文学状态。”（见《文学世界共和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当然所谓“祝圣”也必须是在具有公信力的前提下，在作品富有文学空间可能性的条件下，才可实现，否则只能适得其反。

海勒根那的《请你喝上一碗哈吐布其的酒》在作者的创作中较为特别，主要表现在它的结构以及寓言性与纪实性的结合。小说框架是寓言小说的形式，但其中加入或者展示的是非常现实的内容——关于扶贫的主题。关于扶贫题材的小说，我们已经看过很多了，而海勒根那将这种题材融入在一个带有寓言形式的作品中，显然是有难度的。故事很简单，一个神秘的似乎源自中世纪的牧人来到一个叫哈吐布其的村子，像是路过，又似专门来访。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们凑上来想打听他的姓名，可他不知是故意回避还是因为不适应现实的氛围，打了一个震惊四座的喷嚏，吓退了众人。于是人们只好称他为“远方的朋友”。他身材高大，穿古旧长袍，一身武艺，且笑容可掬，谈笑间吃掉了大半只羊，喝光了村子里所有的酒，最后扬长而去。

我一直在琢磨，这个神秘的大个子与小说中的现实到底是什么关系？仅仅是小说的一个视点吗？抑或是长生天或是古代的祖先派来看望和考察当今蒙古人变化的使者？马尔克斯的小说《巨翅老人》中也有一个类似的角色，它是落入凡间的天使，只是翅膀受了伤。但现实并没有给他如天使般的境遇，他沮丧地自我修复，然后默默地离开，仿佛没有来过人间。海勒根那显然受过这篇名作的影响和启发，但他的这篇小说却反其然，村民们尽管感到来人的陌生，但却对他充满好奇和热情，这也应了蒙古人对外界和外来人的态度。只要是来访者，没有敌意，都是贵客。我以为，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小说叙事的隐藏的视点，他还是一个使者，如天使般，适时地降临人间，传达上天的旨意、保佑众生，担当着人间的监察者和记录者。这与蒙古族传统的“孛”（萨满）显然有共通的地方。蒙古族的神——长生天，就是通过“孛”将神旨和生存的权力以及合法性传达给人间，以保护和扶植广大蒙古人。这位“远方的朋友”显然是一个作者想象的长生天或者祖先派遣的使者或者化身，他看到了当下蒙古人的幸福、自足、自由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国家的扶贫计划，让很多贫困的牧民得到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这当然会让他感到欣慰。小说正是借着牧村的长者、“上边派来”的第一书记，还有屠夫“狼赫尔”之口，向读者展示了新牧村的新面貌，看似无意，实则匠心，巧妙地将扶贫题材巧化于无形。这是小说的高妙之处。但是，作为冷静的读者和评论者，我有一点疑虑，牧民们在物质上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满足，已经不需要这位使者的帮助，他们甚至用怜悯的目光，将他当作流浪汉，给予善意的同情和嘘寒问暖，使者也发现了与这些现代蒙古人之间的距离和隔膜。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传统的民族文化和风俗是否还在被继承延续，或是在慢慢地消逝？在我看来，“远方的客人”是传统的蒙古人形象的象征，他的传统的服饰、礼仪、举止，甚至他吃肉时的干净利落和有力的牙齿等，都提示着人们的记忆，人们只能在历史与神话中才能寻找到与之对应的蒙古人的英雄的故事：传奇的博克手都仁扎那、《蒙古秘史》中能吃能喝的大巴鲁剌、圣主成吉思汗的四獒之一、神箭手者勒蔑以及蒙古人传说中的“酒神”。这种矛盾的情感和文中潜藏的疑问，我以为可能是这篇小说真正思考和表达的意义。

纵观海勒根那的小说，给人的总体感觉，他像是一位吃狼奶长大的写作者，除了蒙古族的传统与现实的滋养，他的写作更多地属于西方文学的脉络，尤其是受到拉美幻想文学的影响。我觉得他的路子是对的，因为蒙古历史和传说，还有辽阔神奇的内蒙古草原就是充满想象和神秘的地域，不曾在那片土地生活过的人无法想象其内在的深厚与顽强的生命力量。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中，很多人生活于现实的空间，而海勒根那则存在于超现实，或者游走于现实与超现实的交叉点上。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时超现实远比现实更真实，更有穿透现实的张力。这就是艺术的可贵之处，也是海勒根那小说的独特价值。